



复旦
中华
文明
研究
专刊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两次复兴

汲 喆 田水晶 王启元 编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两次复兴

汲 喆·田水晶 王启元 编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两次复兴/汲喆,田水晶,王启元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8
(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

ISBN 978-7-309-12306-7

I. 二… II. ①汲…②田…③王… III. 佛教史-研究-中国-20世纪 IV.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2288号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两次复兴

汲 喆 田水晶 王启元 编

责任编辑/张旭辉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52千

201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2306-7/B·577

定价:4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CSCC)成立于2012年3月。ICSCC以复旦大学人文学科为平台,旨在依托本校深厚的人文学术资源,积极推进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研究,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我们知道,自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来华以后,欧洲和北美,即所谓“西方”的学者对中华文明展开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历来称为“汉学”(Sinology)。近年来,中国学者为了与清代“汉学”相区分,又称为“海外汉学”。在美欧,学者为了区别传统的 Sinology,又主张把现代研究称为 China Studies(中国学)。ICSCC旨在促进中国大陆学者与海外汉学家在中华文明研究领域内的国际交流,推动双方之间的对话与融通。

历史上,欧美汉学家有自己的旨趣和领域,他们的方法和结论,常常别开生面,新论迭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以外的国际学者早已跨越障碍,深入到中国文化内部;中国大陆的新一代学者也已经接续百年传统,回到国际学术界,与海外同行们频繁交流。即使如此,海外汉学家和中国本土学者在很多方面,诸如文献整理、田野调查、新领域开拓,以及方法论、世界观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海外学者所长,即为本土学者之短,反之亦然。有一种观点认为,本民族的文化,很难为另一种文化之内的学者所理解。甚或是说:外国人必不能以正确的方式看待“他者”的文明。这种观点的不合理处,在于用某种原教旨主义的方式堵塞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事实上,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现实中,人们都不只是生活在单一的文化中。东海西海,圆颅方趾,文化的特殊性是相对的,人性的共通性才是绝对的。为了达成对于中华文明的正确理解,显然还需要中外学者坐下来,用

对话、讨论的方式作沟通与融合。无论如何，海外汉学家早已成为与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华人学者同样重要的研究群体，他们对于中华文明也有着独到的理解。“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本土学者加以重视，全单照收和简单排斥都是要不得的极端态度。

400年前，明末“西学”翻译运动先驱徐光启(1562—1633)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历书总目表》)我们把明末的这句格言引申出来，作为中外学术交流中的“金科玉律”。中西方学者之间相互借鉴，了解对方工作的真实意义和真正主张。立场不同，可阐发双方优长之学；视角各异，可兼收领域互补之效；观点针芒，实则可以在讨论之后达成更加充分的会通和融合。400年来，明、清、民国的经学家、国学家，一直和欧美的传教士、外交官和“中国通”切磋学问，现代中国的儒学、佛学和道学，无一不是在与利玛窦、艾儒略、林乐知、李提摩太、李佳白、费正清、李约瑟等欧美学者的对话交流中，经过复杂的交互影响而形成的。离开了“西学”(Western Learning)和“汉学”(Sinology)的大背景，从徐光启、阮元的“新学”，到康有为、章太炎的“国学”，都不可理解。我们相信，学术领域此疆彼界的畛域之分，既不合理，也无可能。海外汉学(中国学)与中国本土学术并不冲突，所谓的主客之争、长短之争，那种有你没我的势不两立，完全没有必要。

有鉴于此，ICSCC设立专项资金，面向海外，每年邀请国外优秀中青年学者访问复旦大学，与本校、上海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的同行学者充分交流。交流的形式，即通过他们的学术报告、小型工作坊、论文出版，以及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等，构建访问学者与复旦和国内学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体系，促进海外汉学(中国学)家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研究学者之间的互动。我们邀请来访的海外学者与ICSCC指定的本土学者合作，把他们共同主持的工作坊论文，经过作者本人的修改、增订，或由编者整理、翻译、记录，结集出版。我们希望藉此工作，展现中外学者精诚合作的成果，以饗学界。

前言

从19世纪末开始,种种世俗主义观念,伴随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而来,中国宗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迁。就此而言,佛教的遭际并不例外。一百多年间,不仅佛教与国家及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佛教本身的教理论述、组织形态、实践方式、传播策略和经济结构等,也都大幅更新。这些变化集中体现为20世纪两次令人瞩目的复兴。第一次从太平天国之乱之后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另一次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时历尽三十年厄难的中国佛教,终于迎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今天,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演变,同时也受到诸如国际移民的增加、通信技术的发展等全球化现象的影响,中国佛教在21世纪正经历着一系列新的深刻变化。

迄今为止,对这两次复兴的研究还远远不足。相对而言,对于20世纪上半叶佛教复兴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不过,对此番复兴的观察与解释仍然显得比较简化,佛教变迁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仍有待深入分析。对第二次佛教复兴的研究的量与质,不仅与这一复兴的规模和影响极不相称,而且它与第一次复兴之间的联系也很少得到关注。正因如此,我们一方面期待能够拓宽视野,将佛教的现代变迁,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脉络和更为长期的历史时段中,考察佛教的不同方面,并兼顾不同来源的素材(档案、访谈、统计资料、田野调查等等);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打通对这两次复兴的研究,对有关“复兴”的事实重新加以细致地检视,以便我们对历史和现实能够达成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基于这种考虑,2013年12月17—18日,我们在上海复旦大学组织了为期两天的工作坊,邀请了来自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不同

学科的中外学者,也包括对中国佛教发展有亲身参与和推动的人士,对中国佛教在1949年之前及1980年后的两次复兴加以比较研究。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tudie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联合法国社会、宗教与政教关系研究所(Groupe Sociétés, Religions, Laïcités)由汲喆主持的“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佛教”(Le bouddhisme après Mao)项目,为这次工作坊提供了慷慨资助和必要的学术与行政支持。

本书即这次工作坊上发表的一部分研究作品的合集。为了充实内容,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几位当时并未与会的学者惠赐专文。这项集体成果旨在通过个案研究和概括分析,考察晚近中国佛教史上这两次复兴的各自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连续性,梳理出佛教之现代变迁的一些关键脉络,同时也尝试揭示出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重要方面。

这种比较研究使我们首先注意到,20世纪的两次佛教复兴的历史背景具有某种独特的一致性。民国佛教的复兴所针对的主要是太平天国(1851—1864)在19世纪中期所造成的大规模破坏。当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主要对应的则是由文化大革命(1966—1976)所造成的另一场浩劫。这两次毁教运动与一千多年前那几次著名的法难都极为不同。“三武一宗”灭佛不仅时间短,其影响也只是地方性的,而且灭佛的主要原因(尽管不是唯一原因)是为了减缓佛教对当时政权的社会与经济冲击。与之相比,太平天国与文化大革命持续长达十年甚至更久,危及中国的广大地区。尤其是,这两场运动都基于某种普遍主义和具有全球色彩的乌托邦论述,都受到了现代西方意识形态的某些影响,并根据“中国特色”的地方因素对这些意识形态进行了重新诠释。它们所针对的不单单是佛教。在一定意义上,所有宗教都被这两场运动背后的现代膜拜视为威胁。

其次,20世纪中国佛教的复兴也具备现代性独有的全球化特征。例如,无论在1949年前还是在今天,基督教对于佛教的现代重建,都起到了核心的典范作用,而慈善活动一直都是佛教参与社会建构的主要手段。汉传佛教向东南亚、台湾、香港和美国等地传播,更鲜明地揭示了两次佛教复兴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的全球化维度。我们知道,佛教在海外华人社会的流传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迅速发展,由此形成的跨

国网络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为当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各种物质与非物质的支持。此外,本书中所讨论的佛教复兴的一些核心现象,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例如现代佛教学术的兴起、佛教活动重心向城市的转移、佛教运动与新兴社会团体的结合、出版的专业化及其在佛学传播中的角色等,它们也都与现代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息息相关。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次复兴中也存在更为传统的重建佛教的模式,例如对于戒律的重新整理和重新定制。这种传统的复兴模式根植于佛教长期的历史当中,历久弥新,直到今天仍然保持活力。事实上,佛教既能从外部,也能从内部传统中汲取力量推陈出新,这正是佛教在现代宗教竞争中的一个优势。

不仅如此,我们也不能把当代中国佛教的复兴,看作是对 20 世纪初佛教复兴遗产的简单继承。很多迹象表明,尽管在僧团的教育、社会参与、组织形态,以及僧团与居士的关系等方面,都能发现很强的连续性,我们也不应低估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差异以及它们各自独特之处。这种差异涉及一系列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例如,从结构方面讲,在 1949 年以后,寺院收入的主要来源已不再是地租,而寺院空间的发展也主要取决于国家政策;又如,从微观层面看,当代僧尼出家更多是出于个人选择,较少出于父母的意愿或家庭贫困等原因。可以说,对这类问题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还有大量细节值得我们去调查、分析。

最后,对 20 世纪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也促使我们去反思何为“复兴”。无论如何,有关中国佛教已经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的说法是荒诞不稽的。今天中国佛教的很多指标都远不及 20 世纪初的水平,而且当下的佛教复兴究竟向哪个方面发展、能够带来何种后果也在未定之天。20 世纪中国佛教在义理研究、慈善救济、文化教育、道德维系、对外交往乃至政治参与等方面都确实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但是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佛教的潜力似乎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并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来源和不同形式的限制,而佛教对于当今社会需要的回应,也似乎远远不能令人满意。正因如此,本书的目的无非在于确立一个出发点,以便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更好地理解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与宗教变迁的关系、理解中国佛教的历史命运。

如前所述,这本论文集的缘起,是 2013 年 12 月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

际研究中心所举办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两次复兴”的访问学者工作坊。工作坊得以成功召开，要感谢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金光耀、李天纲、陈引驰诸位教授的大力支持，尤其致意李天纲教授为工作坊召开前后及论文集编辑所付出的一切。此次学术会议的成功举办及论文集的面世，还要感谢中心的章可博士、钱宇老师，及孔子学院专职教师叶李贝贝、方喻老师等所付出的辛劳。工作坊期间，周永生、林秋云、殷琴超等诸君的协助，及论文集编辑时陈洪典、朱明川、周春雨、台大柳雨青诸君的付出，也在此一并致谢。

编者 汲喆、田水晶、王启元

2016年2月

目录

- 1 前言
- 回顾与比较
- 3 王启元 从晚明观晚清：三百年间两次佛教复兴
- 25 张化 20世纪上半叶佛教学习基督教之新复兴
——以上海为例
- 51 李铁华 民国时期都市佛教医药慈善事业略说
李兆健
- 60 汤铭钧 迈向百年中国因明研究的自觉总结与反思
- 78 苏畅 论牟宗三对知礼《十不二门指要钞》之研究
- 98 罗琤 金陵刻经处组织机构研究：1945—1980
- 113 足羽典志子 现代中国佛教的跨国僧俗网络：跨越民族国家的
王达伟 合作模式与资源流通
- 137 田水晶 民国时期的戒律复兴初探

调查与分析

- 153 黄晓星 当代中国佛教的戒律复兴与僧团再生
- 164 安德瑞 佛教慈善与中国的社会政策：替代性社会文明的契机？
- 183 魏明德 社会企业责任、中国与今日佛教
- 194 汲 喆 作为“社会力量”的中国佛教：三十年复兴的现实与潜力
- 213 黄维珊 菩萨出柜：城市、监管与宗教实践

见证与反思

- 231 王雷泉 中国佛教之重建
——以太虚大师《中国佛学》为中心
- 250 李家振 我和当代佛教的因缘
- 264 作者简介

◎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两次复兴 ◎

回顾与比较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佛教经历了两次复兴。

第一次复兴是在晚清时期，由一批高僧发起，旨在复兴佛教的教义和戒律。

第二次复兴是在民国初年，由一批知识分子发起，旨在将佛教与现代思想相结合。

这两次复兴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晚清的佛教复兴运动，是由一批高僧发起的。他们主张复兴佛教的教义和戒律，反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迷信和巫术。

其次，民国初年的佛教复兴运动，是由一批知识分子发起的。他们主张将佛教与现代思想相结合，使佛教成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一部分。

最后，这两次复兴运动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使佛教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佛教经历了两次复兴。这两次复兴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晚清的佛教复兴运动，是由一批高僧发起的。他们主张复兴佛教的教义和戒律，反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迷信和巫术。

其次，民国初年的佛教复兴运动，是由一批知识分子发起的。他们主张将佛教与现代思想相结合，使佛教成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一部分。

最后，这两次复兴运动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使佛教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佛教经历了两次复兴。这两次复兴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晚清的佛教复兴运动，是由一批高僧发起的。他们主张复兴佛教的教义和戒律，反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迷信和巫术。

其次，民国初年的佛教复兴运动，是由一批知识分子发起的。他们主张将佛教与现代思想相结合，使佛教成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一部分。

最后，这两次复兴运动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使佛教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佛教经历了两次复兴。这两次复兴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晚清的佛教复兴运动，是由一批高僧发起的。他们主张复兴佛教的教义和戒律，反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迷信和巫术。

从晚明观晚清：三百年间两次佛教复兴*

王启元

楔子：所谓的“复兴”

“佛教复兴”这个说法，似乎在中古时代的佛教史叙述中并不太多。一部分原因，是缘于中古时的佛教信仰，在帝国上层与民间长期处于极度繁荣的状态；高僧辈出，护法如林，经论著述，被泽天下信众，几乎都没有过太多的间断。即便出现过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举动，实际也不过漫长的中古史中极短暂的插曲。而且，几乎每次法难过去，很快又是一片更为兴盛的崇佛气氛。

中古时代对佛教僧团的崇敬，部分原因乃东传初来之佛教学说，颇能吸引时人之兴趣，亦有其时代有限的知识结构所限。时代逐渐延后，则出现各种新晋思想的冲击，置身其中的各个宗教，都会遇到现实中不同的挑战，佛教自然也不例外。

僧史叙述中的“复兴”意象，往往会叙述成在某位高僧出世之前，曾有过佛法的衰落，而以之显示高僧卓然懿行，高出前贤。然而，那些唐宋以前的高僧出世的片段，都不足以证明曾经真的出现佛法长时间的停滞，而又迎来一个颇不短的复兴区间——这一切在中古以后，便改变了。

南宋覆灭之前即已入主中原的蒙元君主，不再如前朝一般亲近汉传佛教，而是对经历“后弘期”改造的、来自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产生了浓厚的

* 感谢复旦大学亚研中心项目(2015)对本文写作的资助。

兴趣。同时，出于安抚西藏的考虑，蒙元的宗教政策中的“宣政院”系统，也给予西藏贵族及其藏传佛教，在制度上高于汉传佛教的地位。元、明间的佛教制度改革兹非本文重点；但此种近世以后，帝国宗教制度的根本改动，注定了汉传佛教将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挑战甚至是致命的。事实证明，起码在官方上层的信仰生活中，汉传佛教开始逐渐衰落，即便是汉族统治的大明王朝，其前期的绝大部分时候，汉传佛教地位依然没有太大改观。纵观蒙元建元的13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中叶、明万历朝以前，汉传佛教仅仅只在元明易代之际，由笑隐大诃与弟子慧昙、宗泐辈，短暂进入国家生活的视野当中，并不属于本文所欲讨论之“复兴”行列。

整个近世佛教史视野下，唯一在思想文化史上有意义的汉传佛教复兴，就是始自16世纪中叶，大明奉道君主明世宗殒后十年间，穆宗、神宗相继即位，汉传佛教界发生的一场革命性的佛教“复兴”运动，一改当日禅林卑弱的地位与影响，并一直将这股风尚延续至清初。此一汉传佛教的复兴大潮，亦长期与藏传佛教分庭抗礼，即便是最上层的宫廷信仰生活里，也代有汉传高僧的身影。

经过近千年的近世时代，大约明祚斩后二百余年，时间来到了清末，汉传佛教又一起掀起了“复兴”的高潮。尽管与晚明佛教复兴相隔近三百年，机缘、学术上明显有着许多区别，但二者中仍有相通相似之处。其中僧众对于统治者的态度，及藏传、汉传佛教间佛教学术的迁延影响等，有颇多可论之处。虽然学术研究本忌讳“以今度古”、“想其当然耳”的做派；但远近隔空间合理的想象演绎，又为一颇被认可之手段。笔者欲以晚明佛教复兴的多重机缘，以推论三百年后之一场大复兴大变革中诸条细节，或有不合理之处，俟通人学者。

上篇：晚明佛教复兴的一种模式

——以憨山德清为例

查一时代之佛教高僧，需兼有宗教家之学术思想，与政治家之素养智慧，方能兴释迦于末法；然此二种条件，实殊难兼得。更若复欲求一好佛君王如梁武帝、武则天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近世以来汉传佛教，始

终起落不定，或有出于此种原因者。尤其在藏传高僧如萨迦班智达、八思巴陆续出世、蒙元入主中原而尚西番佛教后，汉教遂难回中古时期之高峰——唯有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末之百余年区间内，曾打破过佛教界的平衡。是时，禅林龙象辈出，匡护佛法；除了出现过类似中古时代“转轮天子”之类的上层护持，更重要有如前朝高僧慧远、义净般学行之大德现世，兼有学术、艺术与政治才华，而集天下十方大檀越，共襄晚明佛教中兴盛举，斯有回环曲折大不易之处。

此一时之代表高僧中，以憨山德清(1546—1623)最为典型。作为“万历三

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生前为另两位法友：云栖与紫柏做塔铭传世，总结万历佛教复兴之机缘。晚明“四高僧”中之藕益智旭，又为其再传弟子。憨山弘法一生之中，即有高蹈行走禁宫，也有结莲社于庐山，可为晚明佛教复兴之缩影。憨山诸佛学及外学已有颇多研究，然本节欲从晚明佛教诸多机缘出发，略论其佛教复兴的几种方式。

一、“国师”的代价

佛教初来中土，传道者如道安(312—385)就深明“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道理，^①观吾国史中，佛教依附帝王喜好而成就一时之信仰、学术之高峰，为“佛教史话语中”不可回避的话题，反倒能轻易找出不少成功的实例。东晋高僧道安之后，最为典型的此种高僧要数武则天时代的义净大和尚



故宫藏《嘉兴藏》本《憨山大师年谱疏》卷首憨山像

^① 《出三藏记集·道安法师传》载释道安语，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62页，另《高僧传》载亦同。

(635—713)。唐代政治天才高僧义净，有一段卓越的弘法经历。他除与法显、玄奘并称为“三大求法高僧”及与鸠摩罗什、梁朝真谛和玄奘并称为“四大译经家”之外，义净几为中古时代受到皇家礼遇最高的僧人。他从西域回到中土时，武则天亲自至洛阳城门迎接，“天后亲迎于上东门外”（释赞宁《宋高僧传》“译经篇”）。武曩声称得到民间贡献的“天赐石函”，其中有十二个文字，众不能识；义净辨认后翻译出来的是“天册神皇万岁忠辅圣母长安”，武曩大喜，于当年九月为自己加上“天册金轮大圣皇帝”的称号，改元号为“天册万岁”。宋人赵明诚谓“义净方外之人而区区为武后称述符命，可笑也”（赵明诚《金石录·唐圣教序碑侧》），言下则是深知义净政治意图之意。

今人研究指出，政治高僧义净最关键的作为，是证明武周政权来源于佛教之合法性，如其解读“天册神皇万岁忠辅圣母长安”，是为武则天加“金轮王”的讖符应验；至于氏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内出现“洛阳无影”，似用天竺学说证明武周所定都城洛阳为天下之中，亦甚可能与则天皇帝迁都洛阳、以承周制，息息相关。^①此种政治才华出于方外之手，为吾国史中卓然一笔；佛教亦因有如此天才大德，遂得以蓬勃发展。如此，则政治保障为佛教发展之必要条件。

中古时期佛教长期处于兴盛的状态，尚且需要如此精心地维系政教间紧密的关系；何况肩负复兴大业之晚明僧众，更需要以方外比丘之身，积极投入帝国的政治生活中了。从万历初，晚明佛教迎来了各种机缘，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一大护法、神宗生母慈圣皇太后。此一干政之太后，同时对佛教有极大的兴趣。这种信仰兴趣的背后，同时掺和何种政治诉求，非本文主旨兹不赘述，但作为肩负复兴重任之高僧，却已负有为之挺身而出的勇气与使命。而晚明佛教改革中最为亲近明朝宫廷的汉传高僧，无出憨山德清之右。

憨山早年曾问法于京中硕德遍融真圆与笑岩德宝，后至五台山参访。万历九年无遮会罢，旋赴崂山建海印寺，并与道士相攻，最终因各种机缘被迫入狱流放。憨山于前期弘法最为重要三大作为：一为五台山无遮大会，

^① 此说参孙英刚氏：《“洛阳侧影”与“洛阳无影”》[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及《武则天的七宝——佛教转轮王的图像、符号及其政治意涵》(《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2期)。